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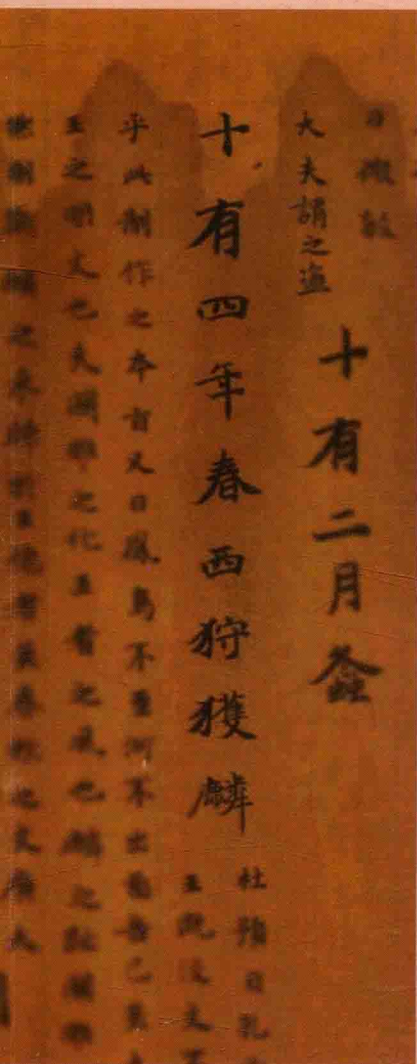
追寻平实精微

——汉唐春秋穀梁学论稿

张沛林 著

中国历史研究学术文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
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

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中国历史研究学术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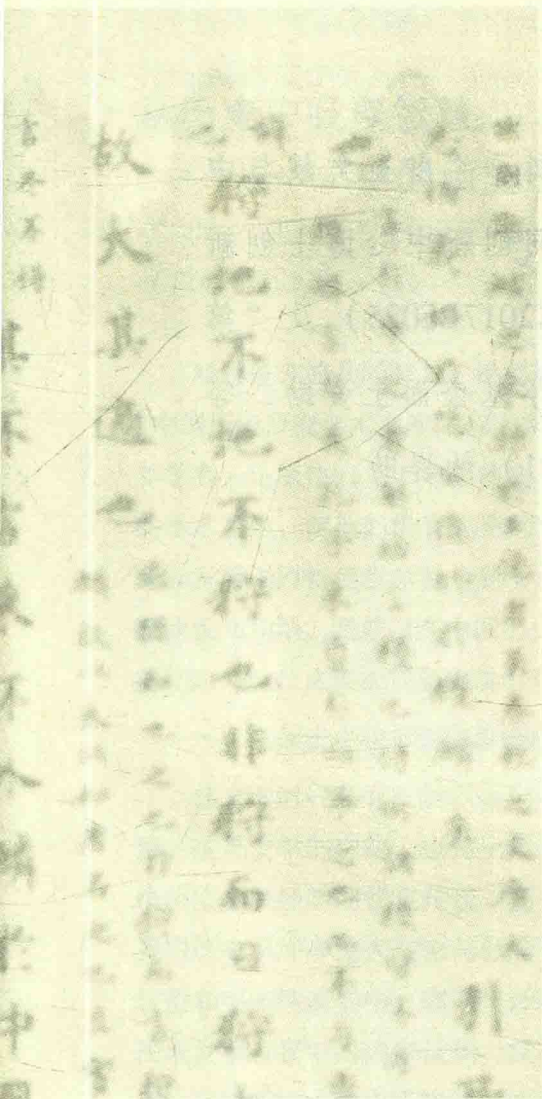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
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

编

追寻平实精微

——汉唐春秋穀梁学论稿

张沛林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寻平实精微：汉唐春秋穀梁学论稿/张沛林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9.5
(中国历史研究学术文库)
ISBN 978-7-5334-8367-8

I. ①追…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历史—春秋时代—
史籍②《穀梁》—研究 IV. ①K22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21274 号

中国历史研究学术文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 编
Zhuixun Pingshi Jingwei

追寻平实精微

——汉唐春秋穀梁学论稿

张沛林 著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25 网址：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0591—83716932

发行部电话：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出版人 江金辉

印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福州市福兴投资区后屿路 6 号 邮编：350014)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2.75

字数 160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8367-8

定价 41.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出版科（电话：0591—83726019）调换。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博士创新资助项目”（CTWX2017BS025）及“第63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二等资助”（2018M631681）的资助。

从历史中吸取智慧

——“中国历史研究学术文库”序

卜宪群

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在福建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历史研究学术文库”和大家见面了。这套文库将主要面向中青年学者，出版他们关于中国历史与文献研究方面的论著，展现他们的学术风采，使他们沿着先贤的足迹，不懈努力，勤勉进取，为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做出贡献。文库首批图书出版之际要我说几句话，我就以在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为底稿，就新时代为什么要加强历史学习和历史研究谈一点粗浅的体会。

一、从历史中吸取智慧是新时代的需要

伟大的时代必有史学的参与，史学也必将为伟大的时代贡献智慧，这是史学的功能，也是史学家的职责。中华民族素有学习和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的优良传统。历史学习、历史思维、历史借鉴，在我国历史上许多重大政治与社会变革中，在许多思想、文化的重大转折和突破性演变中，都产生过强大的推动作用。史学在维护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上产生过重大作用。回望历史，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中华文明的长期延续，使中国历史发展既艰难曲折又波澜壮阔，呈现出自身的特点与规律。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与继承历史传统，是中华民族一次次登上人类文明高峰的重要基础。我们党历来重视历史学习，从历

史中吸取智慧，不断开拓前进。毛泽东同志十分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他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1944年，毛泽东同志批示延安的《解放日报》全文转载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目的是以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集团为例，教育广大干部和全党同志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从而把延安整风运动推向深入。实事求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这四个字也是从史书中发掘出来，并赋予了新的含义。

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绩，昭示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2〕}这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与“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如同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政治家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探索未来一样，习近平总书记深知，在这片土地广袤、人口众多、历史积淀深厚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中国特色，必须坚持中国国情、中国道路，这须臾也离不开历史思维。因此，他高度重视历史学习，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他多次强调历史认识的重要性，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他十分强调吸取历史经验的必要性，指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总书记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讲清楚了我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历史必然，讲清楚了我们为什么要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及其在新时代的重要意义。

二、历史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在治国理政上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智慧，我认为以下三个方面尤为值得重视与总结。

其一，创造并长期维护了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体系。源于先秦的“大一统”思想和理念，在秦汉以后转化为政治实践，形成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治理体系。这一体系既包含了先秦以来历史文化遗产的某些因素，更深刻体现了战国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国家治理体系上的政治诉求。这一治理体系符合我国历史实际，得到了历代有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高度认同，具有深厚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我国历史上秦汉唐宋元明清所创造的数座文明高峰，都与这一治理体系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不可分割。中华民族之所以产生并长期凝聚不散，也是这一治理体系延续不断的结果。这充分说明大一统的国家治理体系深得人心，是趋势，是潮流，符合我国国情。世界历史上也出现过不少盛极一时的强盛帝国，但最终都走向分崩离析，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缺少我们这样长期凝聚而成的共同经济联系和历史文化认同。历史反复证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完整与安定是国家治理的前提条件。任何分裂与动荡，都会导致国家与人民陷入灾难。这一历史经验与教训，我们今天仍然不可忘却。

其二，形成并不断丰富完善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系列治理理念与制度体系。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各民族智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边疆、民族等一系列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建设上都有缜密的思考。例如自西周开始，敬德保民的人本、民本意识开始产生，春秋时期“神”在政治中的作用进一步动摇，民本的呼声更加高涨。发轫于先秦的民本思想，在我国封

建社会更是演化为许多具体的治理措施。又如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尚贤”呼声，推动了当时各国选贤任能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并对我国封建社会选贤任能的制度化建设、德为才帅的用人理念产生了重大作用。再如春秋战国时期法治思想的产生与实践，极大丰富了人们对法制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的认识。而秦朝严刑峻法致二世而亡的教训，又直接导致汉代以后“德主刑辅”治理理念与政策的产生。历代所形成的以民为本、德主刑辅、严格吏治、选贤任能、反腐倡廉、基层治理、民族认同、生态保护等思想与制度，内涵极为丰富，其历史智慧至今仍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

其三，构建并传承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价值观。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认识到“是非不乱则国家治”的道理。要做到“是非不乱”，就要有正确认识事物、正确评判事物的共同价值观。中华民族讲求礼义廉耻，提出“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中华民族讲求正己修身，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中华民族讲求变革进取，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此外，厚德载物、居安思危、自强不息、勤劳事功、和而不同等价值观，在历史上都成为凝聚社会的精神核心力量，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正是这些精神，使我们的祖先在国家治理上表现出政治秩序、文化秩序、社会秩序相统一的特点，形成了“是非不乱”的共同价值观，对治国理政、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产生了积极作用，形成了富有鲜明特色的中华精神文化，至今仍有其不朽的价值，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中国有着悠久的古代史学传统，有着近代以来实证史学的丰硕成果，更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形成的科学历史理论体系。丰厚的史学遗产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广大中青年学者需要认真学习和吸取。这套文库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坚持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借鉴古今中外一切科学的史学研究方法，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做出贡献。同时，我也真诚地希望史学界的青年朋友积极给文库投稿，希望史学界的老朋友关心支持这套文库，将优秀的学术著作推荐给文库。

最后，祝这套文库的学术生命常青！

注释：

〔1〕《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

〔2〕《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

目 录

引论:孔子“作《春秋》”与《春秋》“三传”的解经模式	1
《春秋穀梁传》“发问”刍议	35
“鲁学”的建立与秦汉儒家对齐鲁“初政”的认知	58
刘向春秋学初探	80
郑玄穀梁学考述	101
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解经方法的疏失	121
《春秋穀梁传疏》所称“旧解”考	146
杨士勋为刘炫受业弟子考 ——以“先师”词义的历史转变为线索	159
杨士勋《春秋穀梁传疏》“重发传”说研究	167
主要参考书目	191

引论：孔子“作《春秋》”与《春秋》 “三传”的解经模式

有学者认为：“在《春秋》‘三传’中《穀梁传》最少价值。”^{〔1〕}

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应该不在少数，笔者就曾在七八年前，听一位先生讲：“应该学习《公羊传》，《穀梁传》并没什么。”于是受着类似于这种评价的影响，在群经中，我最晚接触的恰是《穀梁传》。那是2012年夏天，本科毕业的暑假，突然想试着读读《穀梁注疏》，一读便有了全新的认识。

硕士一年级，同门的一位师姐博士毕业，她的研究方向也正是《穀梁传》。得知我正在学习《穀梁传》，她问我《穀梁传》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一时回答不出，反问了她同样的问题，她说：“清通简要。”这四个字，我记忆十分深刻。在随后的四五年的时间里，我继续阅读《穀梁注疏》，从每天用两个小时看三四页，到看半卷，再到可以看完一卷，二十卷书前前后后看了许多遍，写了十余万字的札记。因为确实愚钝，又有“拖延症”，勉勉强强凑出了博士论文。看的遍数不少，所获有限，但如果有人再问《穀梁传》的特点，这次我可以交卷了。同样用四个字：平实精纯。

“三传”各有优劣：《公羊传》发明幽旨，但似“村朴秀才”，如“君子大居正”，说法稍显迂阔，不如《穀梁传》平实。《左传》辞气雍容，记事明晰，是“文章祖庭”，史家楷式。但多含权诈，义理乖违，如“惜也，越境乃免”这样的“混账话”，真可说是伪造圣言，厚诬夫子，不如《穀梁传》精纯。当然，《穀梁传》也常语焉不详，有无关宏旨，甚至扞格不通处。研究“三传”，似当具备“理解之同情”，导扬其各自的优点，善用阙如，而不回护错误。

解经要“疏通知远，平实精微，斯为上善”。^{〔2〕}“平实精微”，大概如《程氏易传》《四书章句集注》这样的著作是配得上的。《穀梁传》解《春秋》经，似乎还未到入微的程度，但历代儒先疏证《穀梁传》及笔者自己的理想，未尝不是追寻“平实精微”。这本小书是关于《穀梁传》及其在汉唐时期学史的研讨，是从笔者博士论文中选取几个片段，修改或重新创作后形成的八篇文章。它将编入到一套学术丛书中，而笔者将其视为一个梳理“常识”的读物。因为自古至今，《穀梁传》是一部很少被人重视而又取得经典地位的书，一些基础的概念与知识是亟待重新认识的。八篇文章彼此间并没有过多联系，且有些篇章论述过程琐碎，但目的就是努力使“常识”更清晰一些。本着上面谈到“理解之同情，导扬其各自的优点，善用阙如，而不回护错误”的态度，冀能取得一点成绩。

在开始本书正式内容之前，首先对“孔子作《春秋》”与“三传解经模式”两个无可回避的基础性问题，作一个粗浅的说明，是为基础。

先看第一个问题：孔子“作《春秋》”。

新文化运动到当下的百年间，古人心中的“圣作六经”在先后几个历史阶段内得到了并不全面的批判。但从较主流的研究方法上来说，新式的学者并未超越前清耆宿名儒很多，只在对新材料的运用上积极而恰当。胡适之、傅斯年等改换风气的“预流”学者在著作中严谨的考据，无非是对清儒的继承。举例来说，傅的《性命古训辨证》就是延续清代学者的话题与方法。这样的力作出色且可以引领时流，在于将清人片言只语的注释、札记、序跋等变换为论证更为严密，材料支撑更为丰富，且格式更为规范的“现代化”论文。

而近当代的学者群体，相较于旧时学者，最大的变化在于他们持有受西方及现代化影响的视角，并深信这些新理念的正确性。似乎打破前人“尊经崇圣”的观念，便可使研究更为客观真实。

以《诗经》为例，在当下多数著作中，“《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有些严谨的学者会将这句中的《诗经》替换为“《诗》”

或“《诗三百》”。对比前后两类称法，前面一种或有意或无意地取缔了在汉儒“《诗经》”概念中实实在在的经学属性，即取消了经学作为一门实有学科的地位。但《诗经》的名称，本来就是汉儒确立并普遍使用的，将其转换成文学史概念似乎不妥。近代学者并未说明而“自然”且“公认”的使用，体现出经学与文学已不再是同一范畴中的概念了。同样，攻讦、反对《毛传》也存在问题。如《国风》中诗篇的来源确实为民歌，但保留在《诗经》中的文字一定经过了官方的润色。即便没有润色文字，也必然润色了义理，这样才能在庙堂之上呈现。近代的学者否定了这一庙堂之上的实情，直接将《毛诗》文本当作了民间的研究材料。

可以说，中国近代所谓“科学的”是一种“宗教”，具备较强的排他性，严重禁锢了学者的思想，使理解变为单向度。

“《诗》亡而后《春秋》作。”《春秋》作为“五经”之一，至圣先师孔子的唯一制作，其“经学”的研究方式在近代“科学的”方法冲击下，面临同样问题。《春秋》文本简略，非依附传记不能解读。唐宋时期虽有“三传束高阁”及重作传的风气，但绝大部分的疏解、研究是依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及《胡氏传》等经典著作展开的。近代则绝少有为《春秋》重作传者，对《春秋》的相关研究论述，便出现在学史、概论中，且话题多相同。

如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运动是近代文化变革之初学术层面的重要思潮。由他讲授，刘起釭先生记录的讲义小书《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中第二章《春秋经论》，谈到《春秋》的体裁、作者、命名、用历四个问题。^[3]“作者”一节论述最详，认为笔削“鲁史”作《春秋》者并非孔子。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初，可以说是近七十年中最重要的春秋学著作。《前言》讨论“《春秋》名义”“《春秋》与孔子”“《春秋》评价”等几个话题。^[4]书中直书圣讳，体现时代印记。考据尚有理据，但下结论也常不留余地。如他认为《春秋》和孔子的关系，仅仅因为孔子用《鲁春秋》教授过弟子。^[5]赵伯雄先生的《春秋学史》是

新世纪影响最大的春秋学史著作。在第一章中，“《春秋》的性质”“孔子与《春秋》的关系”“春秋学的形成”三节专门讨论《春秋》。^[6]赵先生论证较严谨，如比较上引杨伯峻先生关于孔子与《春秋》的观点，赵先生说：“不管孔子是否作过或者修过《春秋》，孔子与《春秋》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7]虽然两位学者皆谈孔子曾用《春秋》作为教材，但辞气有差别，杨先生多少有贬损义，而赵先生则缓和而近实。

以上略述三位学者所研讨关于《春秋》的话题，虽不能涵盖百年来所有“科学的”关于《春秋》的研究，但可以反映出学者们一些集中关注的问题。其中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因其意味着《春秋》的“性质”与“作用”。是“经”是“史”？有“大义”还是“直书”？《春秋》是否为孔子作，完全将文本研究带向两个不同方向。也就是说：孔子作《春秋》是春秋学作为经学的第一基础。如果《春秋》的作者不是孔子，那么无论如何，在《春秋》研究中也并没有谈论经学的必要，以往两千年的研究，大概都可取消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宋前文献恐怕无一同于作者创作时的模样。又先秦典籍，不论是否脱漏、散乱，皆有逐渐增减、添补的嫌疑。鲁史《春秋》旧本不能还原，今日所见，只是前文提到一些学者所说“与孔子有关系的《春秋》”。也就是说，不同立场的学者，或以为孔子作或以为非，都是根据有限且相近的无法还原原貌的史料进行分析。近代“科学的”结论与古代学者言论，多少都有臆测的成分，这一点应该是首先明确的。

但我们还是有必要回顾该问题，尤其是一些历代学者反复征引、阐释过的孔子作《春秋》说。目的在于观察学说演进、存在的误解，以及一些思维、方法上的局限。

《孟子·离娄》：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

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8]

《孟子·滕文公》：（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9]

诸说之中，《孟子》成书距孔子时代最近，故上引两段是讨论“孔子作《春秋》”的历代学者必引述的。但两段似乎存有明显的矛盾：《离娄》中以孔子据“鲁史《春秋》”而述“义”，而《滕文公》则直以为“孔子作《春秋》”。^[10]俞樾《群经平议》以为“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取”训为“为”。^[11]俞曲园目的明显，是为沟通两段字句，调和上述矛盾。但以“作《春秋》”释作“为《春秋》之义”，终嫌增字为训。

案《孟子》文意并非前后违背。统观两段，说周弊《诗》亡而诸国作史，又说“《春秋》天子之事”，是说鲁《春秋》本来就不当作，孔子《春秋》也不当作。当时诸侯并非不应置史官，诸侯国亦有正常的史文，而王者观风教如《诗》的义不能出于诸侯。孟子说的不当作的《春秋》是合“文”与“义”的，“《诗》亡然后《春秋》作”首先反映出，春秋时各国史文已多有褒贬，董狐笔便是例证。而《孟子》以《春秋》继《诗》，其核心明显在“义”，否则以文本论，《春秋》是编年的史文，如何继承《诗》的体裁？

可以说，孟子将“文”与“义”放置在著作概念的同一层次上，孔子用鲁《春秋》“文”而阐发自己的“义”也可谓“作《春秋》”。同样鲁《春秋》除去有“文”亦可以有褒贬的“义”在，这是并不冲突的。换言之，哪怕孔子不改鲁《春秋》一个字，而申述有别于鲁《春秋》的“义”，也可以说是独作《春秋》了。

如上，如何理解《孟子》的“作”，更多取决于人对文本的重视程度。以今人创作一个文本才算“作”不同，这里“作义”才是

“作”。孔子自谦“窃取”犹如《论语》中的“述而不作”，是孔子自述“不作”文本。孟子见孔子“作义”便是《孟子》中说“孔子作《春秋》”，两者只是对同一“情况”的不同表达。近百年以孔子直用鲁《春秋》和鲁《春秋》本具褒贬两个事实论证孔子未曾“作《春秋》”的学者，是与孟子在不同的认识下较量。近人的“翻案”，亚圣其实早已给予了否定。

孟子后的学者对“孔子作《春秋》”的认识也多将关注点放在“义”上。其含义有所延展，如常见的君臣之义，又如汉儒常讲的“成一王法”。后世师儒对“孔子作《春秋》”的论述，未必全出于推尊至圣之心，实在是《孟子》的“作义”说流传有序且较为平实。说它“平实”，是因有许多缺乏史料且不能还原的问题，以《孟子》中所载最易说明。但孔子把《春秋》当作教材讲授什么？为什么至“西狩获麟”为止？以《论语》中孔子及弟子言论看，孔子谈“天道”难以得闻，稼穡为小人事，好学、修身与正名、治国之“义”才是惯常谈到的。如此，有一个问题则凸显出来，孔子“破邪显正”而谈“大义”，如《论语》所载，直接口述就可以了，何必借助《春秋》发挥？

《史记·太史公自序》：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12]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一句，司马贞《索隐》以为：“孔子之言见《春秋纬》，太史公引之以成说也。”^[13]但不论此句是否来源于纬书，是否为孔子所说，后人确实看出了问题：孔子谈“义”，何必借助《春秋》史事。《史记》此

段给出了答案，使孟子之后《春秋》以“义”为核心的论断更为严密了。又司马迁有意标明引用了当时春秋学权威董仲舒的话。“群儒首”代表“《公羊传》”一派，提出了一些新的如“王鲁”等“可怪之论”，^[14]这在学术史上始终存在较大的争议，但其内涵也未超出《孟子》中所谓的“天子之事”的范围。可以说孟子说与董说内在核心是相同的，“可怪之论”也非常“合理”。

在上引一段后，司马迁继续论述并得出“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的结论，则侧重于《春秋》“义”的标准。说与《论语》中孔子“君君臣臣”思想最相近，是后世“孔子作《春秋》说”的“主旋律”。^[15]合并《孟子》、董生及马迁说，孔子见周道衰，以“义”为核心，为天子事，而“作”有别于鲁《春秋》的《春秋》，传统的“孔子作《春秋》”说已颇为完满。汉儒的“三统更迭”“为汉定制”，以今人视角看虽怪异，也只是将上述孔子的“作义”机械的神秘化。

“作义”说已然坚实、可靠，而在一些小的方面，有些学者也试图作一些补充：

《孔丛子·执节》：虞卿著书，名曰《春秋》，魏齐曰：“子无然也。《春秋》，孔圣所以名经也。今子之书，大抵谈说而已，亦以为名何？”答曰：“经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则为经矣。且不为孔子，其无经乎？”齐问子顺，子顺曰：“无伤也，鲁之史记曰《春秋》，《春秋经》因以为名焉，又晏子之书亦曰《春秋》。吾闻太山之上，封禅者七十有二君，其见称述，数不盈十，所谓贵贱不嫌同名也。”^[16]

此处不讨论《孔丛子》成书时代及这段是否为真实史料，只看它解决了孔子《春秋》为何不取他名而沿用鲁史旧名的问题。文中，孔子顺的说法为孔子《春秋》与鲁史同名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言外之意，孔子《春秋》“常道”当然高于鲁史《春秋》，“贵贱不